

《東亞區域合作的基礎條件與難點考察》

Basic Conditions for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cooperation

(王少普 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所副所長、上海交通大學環太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摘要：東亞區域合作，是發展東亞和平、穩定、繁榮局面的根本途徑。冷戰後有利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條件擴大。同時，國際形勢的演變，也將這個問題更加緊迫地提到了東亞各國面前。東亞區域合作必須發展，但還面臨許多困難，例如相互信任的缺乏；美國的地位；朝鮮半島與臺灣問題的正確解決等等。東亞峰會的召開，適應了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潮流，反映東亞區域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但是，要使東亞峰會對東亞區域合作過程發揮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還需要東亞各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進一步達成共識，堅持長期不懈的努力。

Summary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is a fundamental way to develop a peaceful, stable and prosperous phase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conditions that are advantageous to the cooperation of East Asian Region have turned out to be more, and simultaneously, with chang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ll 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facing an urgent necessity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within the area.

Although it is needless to s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operation, to well develop it within the region, still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for examples, lack of mutual trus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perly settlement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the Taiwan issues etc. to be overcome beforehand. The opening of the 1st East Asian Summit went with the current of history development and the successfully held summit indicated that the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 has entered upon a new phase. However, to have substantive propelling effects on the region's cooperation from the East Asian Summit, all countries within the region should persistently keep on making their best efforts to reach further consensus on a lot critical issues.

12月14日，首屆東亞峰會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舉行，與會各國領導人通過並簽署了《吉隆坡宣言》，表示同意將東亞峰會建成一個論壇，就共同感興趣和關切的戰略、政治和經濟問題進行對話，東亞峰會在努力推進本地區一體化建設時，將與東盟建設保持一致。

東亞區域合作，是發展東亞和平、穩定、繁榮局面的根本途徑。東亞峰會的召開，標誌著東亞區域合作過程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在東亞峰會召開之際，從宏觀視角，對東亞區

域合作的基礎條件與難點進行考察，對於進一步明確前進方向，是有益的。本文試就此進行論述。

一、冷戰後有利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條件擴大

縱觀東亞歷史，從未有過現代意義上的較為全面的區域合作。東亞歷史上有過三種國際秩序：華夷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冷戰秩序。

華夷秩序是東亞以中國為中心、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一種國際秩序，這種秩序“雖然是若干國家的聯合體制，但其中各國之間並不發生直接關係，而是完全由‘中華帝國’的直接關係規定的一元化上下秩序構成的。”（1）這是一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在這種不平等的國際秩序中，顯然沒有也不可能有現代意義上的東亞區域合作。

“大東亞共榮圈”是當年日本企圖在東亞建立的一種國際秩序。1940年8月1日，日本外相松岡洋右用“大東亞共榮圈”的提法，取代了“大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企圖通過武力征服，在亞洲和大洋州建立起廣泛的以日本為宗主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秩序，並以此為基礎，與英美爭奪世界霸權。因此，遭到了亞洲和大洋州各國的反抗。日本在亞洲和大洋州建立起來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統治秩序，很快陷入瓦解。

冷戰秩序是以美蘇爭霸和在美蘇“相互確保摧毀戰略”基礎上形成的一種相對平衡的國際秩序。這種國際秩序，導致東亞屬於不同陣營的國家在意識形態、軍事、經濟上的全面分裂與對抗。在這樣的情況下，顯然不可能在東亞形成廣泛的區域合作。

但是戰後特別是冷戰以來，有利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條件也在不斷擴大。這些條件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即：1，國家發展方向之相同因素的增加；2，區域經濟規模的擴大和區域內經濟依存度的增強；3，共同安全利益的增加。

1，國家發展方向中共同因素的增加。

（1）日本的民主改革。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走上對外擴張道路的原因是複雜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治上的封建專制與軍國主義化。戰後日本進行了民主改革。戰前的明治憲法以天皇主權為根本原則，天皇的地位是依據天皇的祖先神的意志確定的。當時雖然也有議會，但其上院（貴族院）議員不是民選產生，而是由皇族、華族以及天皇指定的人員組成。天皇與議會共同行使立法權。以天皇為最高統帥的軍部在日本的政治生活中佔據了中心地位。而戰後的日本國憲法則規定主權在民，天皇的地位也以國民的意志為依據。國會兩院議員由民選產生。立法權歸國會。內閣總理大臣及其他國務大臣必須是文職人員，軍人不再具有原來的特殊地位。日本的民主改革與戰後的和平發展為日本與東亞各國建立廣泛、平等的區域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礎。

（2）中國的改革開放。

以1978年的中共11屆3中全會為標誌，中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改革開放的基本要求如下，對內：在經濟上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政治上推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以馬克思主義民主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借鑒人類政治文明包括西方民主的有益成果，吸收中國傳統文化和制度文明中的民主性因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對外：全面進入國際社會，在尊重現行國際秩序的同時，與世界各國一起促使現行國際秩序向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改革開放所追求的目標有三：1）中國的現代化；2）中國的統一；3）世界的和平與繁榮。中國改革開放路線的提出與實行，反映中國放棄了原來的對內以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理論為指導的繼續革命，對外以三個世界理論為指導的世界革命，轉而採取了以實現中國現代化為核心要求的、順應世界市場經濟與民主潮流的路線與方針。這為中國與東亞各國建立廣泛、平等的區域合作提供了重要

基礎。

(3) 越南的改革開放。越南選擇了與中國類似的改革開放道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建設都有了明顯進步。

(4) 朝鮮開始了經濟政策的調整，要求在維護社會主義原則的同時，在經濟運營中爭取最大的“實利”。這樣的調整方向，必然擴大市場經濟原則對朝鮮國民經濟體系的影響。

2，區域經濟規模擴大和區域內經濟相互依存度日益增強。

區域經濟規模擴大。戰後，東亞地區的經濟由日本領先，經歷了三次發展高潮。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的 20 餘年中，東亞經濟以每年 7-9% 的高速度持續不斷地發展。在 1991 年至 1994 年世界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東亞地區（日本除外）還保持了 7.7% 的發展速度。

持續的高速發展，使東亞地區的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中國、日本、韓國、東盟以及中國的香港、臺灣地區的 GDP 總值達到 7 萬 7 千億美圓，占世界 GDP 總值的 21.2% (2) 外匯儲備遠遠超過歐元區。

東亞地區的對外貿易也不斷發展。據統計，1960 年日本、中國、“亞洲四小”以及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與出口額僅分別為 128 億美圓和 117 億美圓，分別相當於同期美國進出口額的 78.1% 和 56.89%，但到 1997 年，上述國家和地區的進口額與出口額便分別上升為 13387 億美圓和 14184 億美圓，分別相當於同期美國進出口額的 1.49 倍和 2.06 倍。分別占同期世界總進出口貿易額的 24.3% 和 26.3%。1990 年至 2003 年期間，亞洲經濟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從 23.8% 上升到 29.4%。(3)

區域內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不斷增強。東亞地區的區域內貿易增長速度超過全球貿易增長速度，在 1985 年到 2001 年期間，東亞地區區域內貿易在世界貿易總量中的比重增長了 3 倍，達到 6.5%。區域內貿易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也增加到 35%。2004 年，中國從亞洲國家的進口額達到 2540.7 億美圓，比上年又增加 35.7%。又據日本財務省發表的貿易統計，2004 年日本對中國的貿易額增長巨大。整個貿易年度，日本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達 11.8278 萬億日元，增加 17.2%；進口達 10.3727 萬億日元，增加 16.7%，總額為 22.2005 萬億日元，超過了與美國的 20.4795 萬億日元，占日本整個對外貿易額的 20.1%。戰後，中國首次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國。

區域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不斷增強，不但表現在貿易額的增加，還表現在區域內大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聯繫的產業分工體系：日本作為東亞地區的超級經濟大國，既是該地區資金和高新技術產品的供應者，又是能源、原材料及消費品的重要市場；“亞洲四小”則是該地區生產設備中間產品和零件的重要供給者，也是資金的供應者，又是能源、原材料的重要消費者；中國與東盟各國則是日本、“亞洲四小”原材料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重要供給者、重要的投資市場和高新技術產品的消費市場。

(3) 中國大陸、中國臺北共同加入 APEC 與 WTO。

3，共同安全利益增加。

中美、中日建交，冷戰時期中蘇與美日兩大軍事同盟的對立，使東亞分裂成兩大對立的陣營。在這樣的條件下，東亞顯然不可能建立平等、廣泛的多邊合作。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中蘇同盟實際破裂。70 年代中美、中日關係改善並相繼建立外交關係。這使東亞不但有美日這樣雙邊的軍事同盟關係，也有了超越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中美日三角關係。相對平衡的中美日三角關係在東亞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這種超越雙邊軍事同盟關係的大國多邊關係使東亞區域合作具備了新的可能。

冷戰結束，陣營對立消失。1989 年柏林牆倒塌，1991 年蘇聯解體。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蘇東市場與美歐日市場的界限打破，中國在 80 年代即採取了對外開放的方針，這使國際市場融為一體，原來東方陣營與西方陣營的對立也從根本上消失。這一變化進一步增加了東亞區域合作的可能性。

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朝韓關係改善。朝韓對立，是冷戰遺留的問題，使東北亞增加了發生突發事件的可能性。1991 年朝韓同時加入聯合國。2001 年 6 月朝韓舉行高峰會談，朝韓關係向著緩和的方向發展。通過六方會談，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得到了控制。

反恐、打擊海上犯罪、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環境保護等需要東亞乃至世界各國合作的問題增加。911 事件發生一周年後，美國總統布希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說：“今天，世界大國發現他們站在一起——恐怖主義暴力和混亂的共同威脅把它們團結了起來”。(4) 這個判斷是對的。不僅反恐問題這樣，打擊海上犯罪、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環境保護等需要共同解決問題的増加，都使世界以及東亞各國的共同利益有了新的擴大。

二、推進東亞區域合作的緊迫性

戰後特別是冷戰後，推進東亞區域合作的有利條件在增加。同時，國際形勢的演變，也將這個問題更加緊迫地提到了東亞各國面前。

1、經濟全球化對東亞各國形成推進區域合作的壓力

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直接後果之一是區域經濟合作的迅速興起。造成這種情況的基本原因有二：其一，發展的不平衡，使不同的國家和地區處於經濟全球化的不同層次之上，從而產生了不同的合作夥伴需求。其二，經濟全球化使得生產要素在世界範圍內流動與配置，從而使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獲得超國界的更大範圍內的生產要素流動與配置的優惠條件，便成為在競爭中獲得勝利的必要前提。這使區域經濟合作迅速興起。而區域經濟合作的不斷發展，將使經濟全球化不斷向著更加密切的方向提升。

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了歐美兩大區域經濟集團速猛發展的情況。

歐洲在 1957 年簽定《羅馬條約》後，歷經 40 年的努力，終於聯合歐洲 15 國 3.8 億人，建成了單一市場的歐盟 (EC)。在這裏，貨物、勞動力、資金、資訊、貨幣可以自由流動。其占世界總量將近 30%。而且可能進一步擴大為包括東歐與俄羅斯在內的區域統合。

美洲則計劃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NAFTA) 發展為包括西半球 34 個國家、8 億人口的全美洲自由貿易協定 (FTAA)。

歐美兩大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不但在它們相互之間，而且給東亞各國造成了相當大的壓力。

對這種壓力感覺最強烈的是與歐美處於同一發展層面上的日本。

曾在 1965 年提出“太平洋圈構想”的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島清認為：面對歐美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日本不得不思考“EU 和 FTAA，歐元和美圓將建立什麼樣的後冷戰新世界經濟通貨秩序呢？”(5) 對這個問題，小島清教授是有部分答案的，他認為：美國在將北美貿易協定擴大為全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以 APEC 為軸心，將亞太地區以自由貿易協定加以組織化”。從而以 FTAA 和 APEC 這兩翼勢力圈作為基礎，建立一個“壓倒於擴大的歐洲的美國所主導的和平”。為此，他主張：“美國在 APEC 的指導作用太強，必須抑制美國出風頭的領導”。“要把 APEC 變成由東亞主導的組織”，並主張：“最好的選擇是建立一個開放的亞洲經濟圈 (AEC)”，“使其發展成為能夠與歐洲及西半球對等協商”的一極。對歐美特別是美洲區域經濟集團的發展表示了擔憂，希望通過發展東亞的區域經濟合作與之抗衡。(6)

2、面對恐怖主義及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加強，東亞如不發展多邊合作，有可能出現新的動蕩。

美國攻打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後，恐怖主義活動並沒有銷聲匿迹，而且出現了向東亞等地蔓延的趨勢，印度尼西、菲律賓等地發生的嚴重爆炸事件和恐怖主義組織揚言要襲擊

馬六甲海峽，就是這種趨勢的反映。

當今世界已經形成了反對恐怖主義的聯盟，美國在這個聯盟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美國對外政策中一直存在的單邊主義傾向也有所加強。

美國國內及世界輿論擔憂美國單邊主義傾向的加強會導致世界動蕩。哈佛大學甘乃迪政治學院院長約瑟夫·奈說：“美國能否獨領風騷不僅取決於我們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而且還取決於我國文化與價值觀的軟力量，取決於我國的政策是否讓人覺得我們聽取了他們的意見、顧及了他們的利益”。(7) 日本前駐印度大使野田英二郎指出：“美國是軍事大國，以它的力量可以推翻一個國家的政權。但政治問題是不能用軍事來解決的。” (8)

這種動蕩不僅會發生在美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而且會波及東亞及世界其他地區。對東亞地區而言，可能發生的負面影響至少有以下幾種：(1) 美國與阿拉伯世界及穆斯林的衝突擴大並長期延續，美國經濟進一步衰退，減少從東亞進口，導致東亞經濟發展遲緩甚至衰退。

(2) 石油漲價或供應量減少，造成東亞能源危機，特別是中日兩國。(3) 東亞支援美國反對恐怖主義的各國政府與本國及地區穆斯林之間的矛盾擴大，增加恐怖主義在東亞活動的可能。(4) 美國在東亞地區的盟國在美國的要求下，爲了配合美國反對恐怖主義的軍事行動，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這可能打破東亞目前相對平衡的安全態勢，在東亞地區引發新的矛盾與對立。

爲了防止與減少上述負面影響，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在支援美國反對恐怖主義的同時，發展東亞的區域合作。以東亞區域合作支援美國反對恐怖主義，也以東亞區域合作限制美國的單邊主義，並以區域合作減少乃至克服東亞在長期的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中可能發生的經濟與政治動蕩。

3. 中日處於發展的重要時期，只有在東亞區域合作中才能謀求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

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國獲得了近代以來實現現代化的最好的國內外條件，經過 20 餘年的改革開放，現代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當然，在中國的發展道路上還存在許多困難，處理不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仍然有可能遇到重大挫折。但中國正處在上升的趨勢中，這是大家公認的。

日本是一個發達國家，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經濟上進入一個重要的調整時期，現在雖然還有困難，但調整取得了效果，日本的產業結構已明顯提升。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中國等國與日本的經濟差距會縮小，但經濟上日本在東亞仍然會居於領先地位。與此同時，日本提出了成爲普通國家乃至政治大國的目標。

上述情況表明：中日兩國現在都處在發展的重要時期。東亞可能出現兩個在政治經濟上都具有強大地位的國家。這是東亞前所未有的變局。這種變局可能導致兩種後果：其一，中日加強合作，並通過中日合作，推進東亞區域合作，使東亞與歐洲、北美一起，在推進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積極作用。其二，中日互相把對方當作爭奪東亞主導權的對手，互不信任，互相對立，甚至陷入軍備競賽之中，從而導致東亞新的對立與分裂。

無論對中日兩國還是對東亞來說，顯然第一種後果是應該爭取的，第二種後果是必須避免的。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出路就在推進東亞區域合作中發展中日關係。

爲什麼必須這樣做？原因有三：

其一，發展東亞區域合作，才能淡化中日圍繞美日軍事同盟產生的對立，增強中日在政治安全上的相互信任感。

對中國來說，作爲一個被美國視爲潛在對手的國家、作爲一個在軍事力量上弱於美日軍事同盟的國家、作爲一個在國家統一問題上受到美日軍事同盟制約的國家，必然以美日軍事同盟的存在爲中日在政治安全上互不信任的重要原因。對日本來說，作爲一個有世界規模經濟的國家、一個在能源資源上大部分依靠外來進口的國家，同時又是一個必須把軍事力量限制在自衛範圍內的國家，在沒有一種更確定的安全環境以前，是難以放棄美日軍事同盟的。

這使得中日圍繞美日軍事同盟產生的分歧與對立，幾乎變成死結。

要解開這個死結，淡化甚至最終解決中日圍繞這一問題產生的分歧與對立，只有在東亞更加密切的區域經濟合作基礎上，發展東亞區域的安全合作，爭取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在東亞形成機制化的區域經濟與區域安全合作。有了這樣的機制，才可能在根本上增強中日在政治安全上的信任感，從而淡化雙方圍繞美日安全同盟產生的分歧與對立。

其二，發展東亞區域合作，有利於為中日關係提供更加廣闊而堅實的基礎。

中日關係目前主要在雙邊領域內發展，多邊領域內合作相對較少。非但如此，中日兩國對對方的多邊活動還表示出強烈的戒備心。1996年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美國反對，中國也不贊成。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領導人商定在10年內建立自由貿易區，日本便有輿論認為這是為了與日本競爭。

如果中日兩國能確立在推進東亞區域合作的過程中發展中日關係的目標，中日便會主動將目前的雙邊合作進一步擴大為在多邊領域內的合作，從而改變上述狀態，使中日關係獲得更加廣闊而堅實的基礎。

其三，在發展東亞區域合作的過程中發展中日關係，可以減少東亞其他國家對中日關係發展的戒心，有利於中日兩國密切合作，推進東亞區域合作。

中日兩國是東亞綜合國力最強的兩個國家，周邊的一些國家希望中日兩國關係保持一定程度的緊張，以利於它們獲得外交空間和平衡手段。這是在東亞區域合作不發展情況下形成的外交觀念和策略。這種情況的存在，對中日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無疑會產生負面影響。如果東亞區域合作能夠得到充分發展，上述外交觀念和策略顯然會改變。那時，中日的密切合作將因有利於東亞地區的區域合作而受到東亞各國的歡迎與支援。

三，東亞區域合作面臨的主要困難及解決方針

東亞區域合作必須發展，但面臨許多困難。目前最大的困難有三個方面：

1，相互信任的缺乏。

東亞地區歷史上只有過華夷秩序、“大東亞共榮圈”、冷戰秩序等不平等的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對立分裂的國際秩序，從未在整個東亞地區形成過廣泛、平等的區域合作。這份歷史遺產留下了巨大的負面影響，至今尚未徹底清除。這種負面影響又與某些現實因素相結合，阻礙了東亞各國建立起充分的相互信任，特別是在東亞兩個最大的國家中國與日本之間。

日本擔心中國強大起來後會要求恢復華夷秩序，中國則擔心日本復活軍國主義。中日兩國之間確實存在一些分歧和利益衝突。但是只要不帶偏見地回顧一下中日兩國的發展歷史，就可以看到，戰後中日兩國都在朝著進步的方向發展。在這樣的大方向下，中國不可能要求恢復華夷秩序，日本也不會復活軍國主義。這應該而且完全能夠為中日建立相互信任，提供必要的基礎。

為了推進這種相互信任的建立，東亞各國應該記住歷史，但更應該超越歷史，從現實和未來的根本利益出發，加強各國之間的相互信任。圍繞歷史問題，中日在戰後已經爭論了50餘年，有的達成了共識，有的可能要再爭論50餘年。這是必要的，否則難以正確總結歷史教訓。但是歷史與現實有聯繫又有區別，與歷史相比，現實與未來應該佔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2，美國的地位。

美國不是東亞國家，但美國依靠它在世界首屈一指的綜合國力，依靠它在東亞的駐軍，依靠它在東亞的盟國，依靠它對東亞巨大的經濟影響，取得了在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這就使得東亞各國在考慮東亞的區域合作時，不得不考慮美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地位。

美國是一個具有兩面性的國家，一方面，它在建立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方面具有領先優

勢，在當今的國際經濟與安全秩序中發揮著重要的穩定作用；另一方面，美國又是一個單邊主義嚴重的國家，日本前外務省次官栗山尚一說：“我與美國打了 30 多年交道，美國的確是單邊主義，但那是有選擇的單邊主義，它根據自己的需要，有時與其他國家合作，有時就自我行事。這是美國的傳統做法。可以說從克林頓政權開始就又回歸到傳統了。”（9）

解決美國在東亞多邊合作中的地位問題，應該從美國的兩面性出發。

首先，應該承認美國在東亞地區有重要的建設性作用。這種建設性作用主要表現在穩定東亞的現存秩序，反對恐怖主義，防止核武器及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以及在資金、技術、市場等方面對東亞經濟的支援。

正是因為美國在東亞地區有這種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因此，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東亞都應謀求與美國的合作，承認美國在東亞的建設性存在，實行對美國開放的東亞區域合作。日本前駐中國大使中島敏次郎認為：“美國從 80 年代起就認為自己不僅是大西洋的力量，也是太平洋的力量。所以，沒有美國的參與就難有亞太的和平。中國和日本與美國關係的好壞也會影響到日中關係，所以，儘管都說美國有單邊主義，但是要努力保持日本、中國及美國的平衡關係。”（10）這個意見是正確的。

其次，應該看到美國的單邊主義在東亞有不可忽視的負面作用。這種負面作用主要表現在東亞各國之間製造矛盾，以便於美國利用矛盾，進行控制；表現為超越國際法以及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干涉他國內政；表現為對東亞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等。日本前駐中國大使中島敏次郎便說：“美國的亞洲戰略就是讓日本和中國成為兩極進行抗衡，這是美國的‘平衡論’”。（11）中日關於釣魚島領土爭端的形成，就和美國的政策有關。臺灣與中國大陸的長期分裂，也是因美國插手而形成的。1990 年馬來西亞總統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協定體”（EAEC），1996 年日本提出建立亞洲貨幣基金（AMF），都因受到美國的反對而流產。因此，在承認美國在東亞的建設性存在、實行對美國開放的東亞區域合作的同時，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應該保持警惕和距離，必要的時候應該進行適當的鬥爭。

如果東亞各國在對於美國的態度問題上能夠達成上述共識，並有效地將其付之於行動，那麼東亞各國在推動東亞區域合作時，應該可以爭取到美國的支援，並促使美國在東亞進一步發揮建設性作用。

3. 朝鮮半島與臺灣問題。

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分裂問題是東亞區域合作特別是區域安全合作難以回避的問題。有人認為“分裂國家間的未承認問題”，“成為該地區緊張的原因”，使地區多邊安全合作難以形成。這種觀點過於悲觀。實際上，冷戰後，朝鮮半島雙方都加入了東亞區域合作的進程。朝鮮繼韓國之後參加了 ARF 的活動。朝韓關係現在有了進一步改善。圍繞朝鮮半島核問題，又舉行了六方會談。這對東北亞與整個東亞的區域合作發揮了良好的作用。

中國大陸與臺灣共同參加世界與區域合作的進程也已開始，臺灣以經濟實體和獨立關稅區的名義與中國大陸先後加入了 APEC 與 WTO。這一事實提供了中國大陸與臺灣共同參加世界或區域合作的一種模式。這一模式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一個中國的原則。一個中國的原則已經成為東亞地區保持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基石，只要不動搖這個原則，中國大陸與臺灣應該可以尋找到在東亞區域合作進程中進一步共同發揮作用的途徑。

東亞區域合作的宏觀形勢表明，東亞峰會的召開，適應了東亞區域合作的歷史潮流，反映東亞區域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但是，要使東亞峰會對東亞區域合作過程發揮實質性的推動作用，還有不少難題要克服，需要東亞各國在許多重要問題上進一步達成共識，堅持長期不懈的努力。

注：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12-13 頁，商務印書館，1980 年版。

（2）《國際經濟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4 年。

- (3) 《國際經濟年鑒》中國統計出版社 2003 年。
- (4) (美)《紐約時報》網站, 2002 年 9 月 20 日。
- (5) (日) 小島清《太平洋經濟圈的生成》序 2。
- (6) 同上第 47、96、97 頁、82 頁及序 2。
- (7) 轉引自(美)《外交政策聚焦》雜誌 2002 年 7 月 2 日文章〈〈走單邊主義道路是自拆臺腳〉〉
- (8) 《中國外交》2002 年第 9 期。
- (9) 同上, 第 34 頁。
- (10) 同上, 第 35 頁。
- (11) 同上第 35 頁。